



第一章

# 青少年時代

一八九三——一九一五年





宋之友  
彭越題

彭越題

## 一、父親——宋氏家族的奠基人

宋慶齡，曾用名慶琳、慶林。英文拼法是 Soong Chung Ling、Soong Ching Ling。

一九二五年後曾使用孫宋慶齡、孫中山夫人、孫逸仙夫人作為署名。教名露瑟蘿，學名羅莎蒙德（Rosamonde），又譯作洛士文，化名蘇吉、林泰、馬丹等，日文化名中山瓊英，一八九三年一月二十七日（清光緒十九年十二月初十），出生於上海一個傳教士後來轉為實業家，同時是革命黨人的家庭。

當時，中國正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統治者的壓榨，



宋慶齡（前排右一）一家。

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嚴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世界資本主義完成向帝國主義階段的過渡，

加緊了瓜分中國的侵略活動。但是，「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 and 殖民地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sup>1</sup>。同時，中國人民對外國侵略勢力和封建專制壓迫進行了英勇頑強的反抗，民族民主革命運動正在興起。宋慶齡的出生地上海地處長江口，踞東南水陸運輸要衝，又是東西洋交通的樞紐。一八四三年，上海作為「五口通商」之一正式開埠，成為資本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的橋頭堡。上海既是帝國主義冒險家的樂園，又是中國人民革命運動的策源地之一。

宋慶齡的父親宋嘉樹（一八六六—一九一八年），在宋慶齡出生前一年，即一八九二年，正式辭去了傳教士的職務，轉向實業界，入股經營教會創辦的美華書館，<sup>2</sup>同時擔任民族資本的阜豐麵粉公司經理，還投資煙廠、紗廠，並進口機器，沒有幾年便成了上海灘一名成功的實業家。在此前後，他結識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開始積極投身於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事業。他冒著被滿門抄斬的危險，秘密地利用自己開辦的家庭印刷廠為孫中山的革命黨

1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六百二十六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

2 過去有關宋家的著作，一般均記載為宋嘉樹創辦了美華書館，實誤。按：美華書館前身名「花華聖經書房」，系美國長老會一八四四年創設於澳門。翌年，該書房遷至寧波，改名為「美華書館」。一八五九年，美華書館遷至上海，並創電鍍華文字模，改革華文排字架，使印刷中文聖經等書大為便利，從而該書館業務得以迅速發展起來。因此，宋嘉樹在一八九二年只是入股經營美華書館，並不是「創辦」。



印刷宣傳革命的小冊子，還盡力資助其革命活動。

以宋嘉樹為首包括其子女兩代人的宋氏家族，富有傳奇色彩。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宋氏家族對半個多世紀的中國政治和中美關係的影響極其複雜和深刻。宋氏家族中，既有從孫中山在世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一直是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戰友和同志的革命者，又有與蔣家王朝貫徹始終的重臣或謀士。在中美關係上，宋家有的成員把美國人民對中國人民的友誼相連，成為中美友誼的紐帶；有的成員則與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活動有關，充當侵略者的幫兇。宋家（主要是宋美齡）確實是曾「影響了兩代美國人」<sup>3</sup>，特別是影響了羅斯福、杜魯門、艾森豪的對華政策，使他們用有色眼鏡來觀察亞洲事態的發展，採取支持國民黨政權、反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立場，進而幫助蔣介石發動反人民的內戰。當然，已逝去的這段歷史陳跡，首先應該從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上來觀察問題，但宋家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在中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變為社會主義強國的翻天覆地的歷史上，深深地留下了宋氏家族一長串各種各樣的足跡。

而在這個家族中，對近現代中國革命影響時間最長、貢獻最大的一代巨人，就是宋慶齡。她的一生，經歷了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三個歷史時期；又在中國人民艱苦奮鬥屢經挫折直至獲得勝利的整個歷程中，始終站在鬥爭的最前列。

在宋慶齡獨立生活以前，宋家成員的情況是這樣的：

3 [美] 斯特林·西格雷夫 (Sterling Seagrave)：《宋家王朝》(The Soong Dynasty) 第十頁，美國紐約哈波斯—羅公司一九八五年出版。

父親宋嘉樹，是宋氏家族的奠基人。他原名韓教准（乳名阿虎），又名宋耀如，西名查理·瓊斯·宋（Charles Jones Soong），一八六六年九月出生於廣東省海南島（今海南省）文昌縣昌灑鎮古路園村（即牛路園村）一個商人之家<sup>4</sup>。

宋嘉樹是一個不受制於傳統習俗的男子漢，一直堅持自己主宰自己，走獨立奮鬥、自強不息的道路。由於拒不接受別人安排的命運，加上具有勇於進取的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思想，他創造出一部富有傳奇色彩的歷史，同時也影響了他的六個子女——特別是三個女兒的命運。

關於宋嘉樹的經歷和宋氏家族的起源，國內外幾本有影響的介紹宋氏家族和宋氏三姐妹的著作，說法相當混亂，傳訛不少。美國新聞記者斯·西格雷夫一九八五年出版的《宋家王朝》一書，根據宋嘉樹一八八一年的一封信，指出宋嘉樹本姓「韓」，不姓「宋」，轟動一時。



宋慶齡的母親倪珪貞與宋子文合影。

<sup>4</sup> 宋嘉樹的出生年份，過去一般均書為一八六六年（清同治五年），但據《韓氏族譜》記載「生於清咸豐辛酉年（九月十四日）」，應是一八六一年。特注錄備考。

其實這不是西格雷夫的新發現，早在一九四八年香港出版的《宋子文豪門內幕》一書，就指出宋家「本姓韓」。以後的著作中，也有類似的記述，如一九六七年美國出版的《美國名人傳記辭典》等書。只是由於沒有提供可靠的證據，一直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

為了搞清楚這些問題，我們查閱了清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年）的《文昌縣誌》、中華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重修的《文昌縣誌》和《韓氏族譜》、《韓氏家譜》，還到海南省文昌縣考查宋氏祖墳碑石，發現了一些有重大史料價值的材料。

宋氏祖墳有韓鴻翼（宋慶齡的祖父）的墓地，位於文昌縣寶芳鄉，墓碑正中鐫刻著「韓考諱鴻翼公之墳」，下款鐫刻「住古路園村男政、教、致准，孫乾、德、裕豐立」，「清光緒十九年秋月吉旦」。韓王氏（宋慶齡的祖母）的墓地位於文昌縣古路園村宋氏祖居附近，立碑人同上，時間是民國六年。韓氏本家祖公碑現保存在宋氏祖居中，碑文中記載了「顯十七代至二十四代」祖考的名字。

根據以上資料，我們對宋氏家族的起源及其發展，作以下簡述：

宋嘉樹遠祖是河南相州安陽人。相州安陽是戰國七雄之一「韓國」的所在地。北宋時，大臣韓琦就是相州安陽人，他抵禦西夏入侵時，建有顯赫功勳，被封為魏國公。後北宋衰亡，韓家被迫南遷，族人韓顯卿曾任廣東廉州太守。一一九七年，韓顯卿抱宗譜南渡瓊州，定居文昌縣錦山，成為韓姓渡瓊第一代。以後，韓姓家族就在海南島繁衍下來。傳到宋嘉樹曾祖父韓儒循這一代時，已是第二十世了。宋嘉樹的祖父名韓錦彝，祖母吳氏，生有二子，名

鴻翼和鵬翼。

宋嘉樹的父親韓鴻翼是一位儒商，為人寬厚，並熱心公益事業，為鄉人所敬重。夫人王氏，端莊文靜，能詩善書，常向子女們講述歷史故事，使他們從中得到教益。鴻翼夫婦生有三男一女：長男政准，次男教准（即宋嘉樹），女三，三男致准。

宋嘉樹的叔父韓鵬翼，娶同縣宋氏為妻。韓教准後來過繼給堂舅——宋夫人之弟，就改姓「宋」，後來發展成為赫赫有名的「宋氏家族」，而其本姓「韓」卻被人們遺忘了。

海南島位於浩瀚的南海北部，北隔瓊州海峽與雷州半島隔海相望，它是我國僅次於臺灣省的第二個大寶島。島上山巒疊起，河網交錯，既有五嶽之壯，又有蘇杭之秀。橫貫全境的五指山，像造物主伸出來的一隻手，向人們無私地奉獻著豐富的礦藏和物產。萬泉河像母親流不盡的乳汁，滋潤著沿海平原的萬頃良田。「自古瓊瑤稱此島，珠崖畢竟占春先。」由於地處北回歸線以南，熱帶和亞熱帶的氣候更使寶島錦上添花，全島終年蔥綠，長夏無冬，山光水色旖旎多姿，椰子、香蕉、荔枝、芒果、菠蘿蜜等熱帶水果品種繁多，四季飄香。其中椰樹幾乎遍佈全島，故素有「椰鄉」之稱。位於島東北部的文昌縣，更是椰子的世界。椰子自古以來就是文昌人民「消食、款客、訂婚多用以為禮」的佳品。縣東的椰樹林無邊無沿，鬱鬱蒼蒼，遠處眺望猶如大海的波濤，洶湧激蕩。該縣椰樹種植面積及椰子產量，均占全島之半。加上長時期以來，由於一代一代接種，雖同一樹種，卻千姿百態，極為壯觀：有的蒼勁挺拔，高聳雲天；有的婀娜多姿，亭亭玉立；有的矮嫩青翠，隨風起舞。尤其那外形像球狀的棕色



椰果，一簇簇，一串串，懸掛在樹冠之上，更加逗人喜愛。可是，帝國主義和封建王朝的掠奪和剝削，接連不斷的天災人禍，竟使這個富饒的寶島養不起自己的兒女。不少壯年男子迫於貧困、饑餓和戰亂，不得不背井離鄉，漂洋過海，流落到南洋、夏威夷、美洲、歐洲各地謀求生路。現在文昌縣全縣人口有四十八萬餘人，而在國外的僑胞總數卻達六十萬人，可見其外出謀生人數之多。

宋嘉樹的堂舅<sup>5</sup>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先流落到美國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亞充當修鐵路的苦力，有了些積蓄後，又轉輾去到東海岸港口城市波士頓定居下來，開辦了一個狹小的專門銷售中國絲茶的店鋪。

宋嘉樹幼年時，由於父親韓鴻翼熱心於公益事業，又不善於理財，幾乎耗盡祖傳積資，加以染上久治不愈的疾病，因而家境日漸窘迫。母親王氏只得領著子女操持農活維持生計，生活極其艱難。後來宋嘉樹在晚年描述他母親的形象時說，她身負重荷，仍文雅高貴；她飽經磨折，仍端莊美麗。沒有一個畫家能夠畫出她那崇高的神韻。<sup>6</sup>從這位老夫人身上，我們仿佛看到了後來宋慶齡的影子。由於家境窘困，宋嘉樹九歲時，即一八七五年夏，隨同哥哥到爪哇一個遠房親戚處當學徒，訂立了三年為期的契約。但在契約未滿時，他於一八七八年初

<sup>5</sup> 堂舅的名字無記載。「堂舅」的英文「uncle」，在譯成中文時，有的寫「叔父」，如《宋氏家族》；有的寫「舅父」，如《宋氏三姐妹》；有的寫「伯父」，如《宋家王朝》。

<sup>6</sup> 參見〔美〕羅比·尤恩森（Roby Eumson）：《宋氏三姐妹——宋藹齡、宋慶齡、宋美齡》第二頁，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遇到了那位在美國波士頓經商歸國探親後轉道爪哇的堂舅，就悄悄地跟隨堂舅橫渡太平洋到了美國波士頓。後來，沒有子女的堂舅在一次重病時，立下遺囑，正式認阿虎（宋嘉樹）為嗣子，把自己的全部家產傳給阿虎。從此，他正式過繼給堂舅，不再姓「韓」而改姓「宋」，取名「嘉樹」，又名「高升」。

波士頓，現在是美國這個年輕國家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有人把它比作美國的「北京」，在當時充滿著青春的活力。經過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波士頓已發展成為美國的大商埠、工業中心和金融中心。這座繁榮興旺的城市，使宋嘉樹大開眼界。

在波士頓生活不到一年，宋嘉樹由於受到美國民族精神中進取性和冒險性的薰陶，不再滿足於堂舅安排的幫助絲茶店經銷的命運，開始追求更遠大的目標。

刺激宋嘉樹走上冒險之途的直接因素，既有探索絲茶店外陌生世界的好奇心，又有與美國對比之下對祖國貧窮落後命運的關切。海南島家鄉的悲慘生活與波士頓繁榮景象的強烈對比，在少年嘉樹心上掀起難以平息的波瀾。他渴望自己的祖國也像美國一樣富強起來。

當時僑居在波士頓的中國人很少，主要是一些被清政府派去留學的官宦人家的子弟，住在查理斯河另一岸的坎布里奇。他們經常光顧絲茶店，在店中高談闊論，更在嘉樹心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這些留學生中，溫秉忠和牛尚周（後來成為宋嘉樹妻子的兩個姐夫）是作為廣東人容閱所組織的中國教育團的成員來到美國的，是一八七一年來自上海的第一批赴美留學生。他

們與宋嘉樹成為好朋友，勸他到學校去學一門有意義的學問，將來回國謀一個理想的職業。他們對宋嘉樹的勸告，使他的命運發生了根本的轉折。

小嘉樹終於下了決心，於是向已經成為他繼父的堂舅提出在美國求學的要求。但是，這個已經被太平洋的風浪磨去了稜角的堂舅，沒有理解搏動於嘉樹胸中的那顆勃勃雄心。他的回答是：「不可能。」他只要求嘉樹做一個安分守己的小商人，繼承他的「家業」。由於與堂舅沒有商量餘地，嘉樹悄悄地逃跑了。他跑到停泊政府船舶的碼頭，偷偷溜進「加勒廷」號緝私船上躲藏起來。

「加勒廷」號當晚起航，在遠離港口的大海上，嘉樹才被發現並被帶到船長面前。船長埃里克·加布里埃爾森祖籍挪威。他有豐富的航海經驗，指揮有方，處事公正，愛護船員，虔信上帝，心地善良。那時，對這樣的偷乘者，船長有權處罰，或令其在下一個港口上岸。但是，船長卻寬恕了嘉樹，據說是他被這個東方孩子的膽量感動了。因為美國人崇尚的就是這種不靠祖宗餘蔭，不靠別人恩賜，而靠自己奮鬥、吃苦耐勞、創造前途的人生哲學。船長的上幾輩人，即最初構成為美利堅民族的那些白種人，大都是在英國和歐洲大陸上被「圈地運動」或殘酷的剝削剝奪了土地、破了產的農民，或被封建暴政宣判為「罪犯」、被正統教派宣判為「異教徒」的人。他們為了逃避暴虐和死亡，毅然拋棄故鄉和親人，以賣身作「契約奴」籌集了旅費和資金，來到北美這塊荒涼的土地上。在五年至十年的契約限期內，他們克服了無數難以想像的艱難困苦，才成為自由人，並逐漸成為富人。所以，美國人從拓殖時代那種艱苦

奮鬥的生活環境中，養成了獨來獨往，不亢不卑，自負自驕，耐勞吃苦的性格。這種性格使他們崇尚平等，愛好自由，鄙視權力和無理干涉。

眼前這個嘉樹，在船長看來，就是具有這種性格的人。這麼小的年紀就不願繼承「家業」，而追求獨立創業；反對干涉，追求自由。這該有多麼大的勇氣和膽略啊！於是他獲得同情，被允許留在船上。在花名冊上登記名字時，「嘉樹」的海南島口音，被英文拼成「Charles Sun」。再譯成中文，就成了「查理·沈」。

嘉樹在船上當了雜役。他以矮墩壯實的個子、溫和幽默的氣質和勤奮的勞動，博得了船長與船員們的好感和喜愛。後來，他又隨船長調到南方北卡羅來納州的威爾明頓港，在一艘「二級明輪」、「科爾法克斯」號上工作。

船長待他親如自己的孩子，教他信仰基督教，經常給他講基督教的故事。

嘉樹沒有忘記自己追求的目標。他在船上向船員學會了用細繩編制吊床的技術，業餘時間勤奮地編制吊床出售，攢錢準備將來上學。他把這個計畫告訴了船長，船長答應幫助他。

當時美國南方的中國人極少，嘉樹是北卡羅來納州人第一次見到的少數中國人中的一個。當他出現在教堂的禮拜儀式上時，引起了轟動。他被船長的好友羅傑·莫爾上校所看重。莫爾是內戰時期的軍人，是當地衛理公會教堂的頭面人物，負責男子讀經班。他又把嘉樹介紹給了湯瑪斯·佩奇·里考德牧師。傳教作為文化侵略的措施之一，早在美國侵略中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望廈條約》中已有明文規定，而且實施多年。這位日夜夢想著實現基督教「拯

救」全世界狂想的牧師，對宋嘉樹產生了興趣。他想，如果讓宋嘉樹受到西方教育，完全可以把他培養成一個能行醫的傳教士。那麼他就可以把技術帶回中國，醫治他同胞的身體和心靈。眾多傳教士的工作，也許能改變中國這個東方神秘大國的命運。而渴望學到一門學問，以便將來為改變祖國的貧窮落後做出自己的貢獻——嘉樹這個樸素的愛國主義思想，曾被溫秉忠和牛尚周二人所啟迪，現在又被里考德牧師的設想所吸引。於是，他終於高興地答應皈依基督教。

一八八〇年十一月七日（星期日）上午，威爾明頓《明星報》登出了第五街衛理公會教堂的一則簡短通知：「今天上午的洗禮儀式將在本教堂舉行。一位中國皈依者將是享受這項莊嚴權利的人之一，也許是迄今為止在北卡羅來納州接受基督洗禮的第一位『天朝人』。里考德牧師將主持儀式。」在儀式上，里考德牧師莊嚴地給小嘉樹施洗禮，並命名他為「查理·瓊斯·宋」。

在異國，又是在舉目無親的環境中，一個十四歲的孩子，沒有驚人的膽略和冒險精神，是不可能做出這樣抉擇的。正是這個抉擇，奠定了宋嘉樹、尤其是他後來幾個兒女在美國的地位和影響，從而也就奠定了他們在中國的地位和影響。

當時美國基督教（新教）的勢力已經伸展到中國，特別是上海。他們在上海的佈道團，有些人進行著正當的宗教活動，另一些人則扮演著美國向中國擴張的幫兇角色。美國在中國取得的第一塊殖民地租界，就是文惠廉主教一手造成的。他來華後，在上海蘇州河北岸的虹



口區購地建造教堂。當時的英租界在蘇州河南岸至今日的延安東路。河北岸的土地在租界外。文惠廉主教見英國取得租界，就步其後塵，在一八四八年向上海道台提出把他教堂所在地虹口一帶劃作美租界。道台是個十分昏庸無能的官僚，竟一口答應，而且慷慨地泛指蘇州河北岸虹口一帶標為美國租界。就這樣，這個主教輕而易舉地為美國在上海建立了殖民基地。美國為了紀念他，把租界中的一條路命名為「文監師路」<sup>7</sup>（即今日的塘沽路）。

顯然，衛理公會為吸收宋嘉樹這樣一個很有培養前途的中國教徒而歡欣鼓舞，他們期望他在未來開拓中國的事業中，能夠起到他們美國人起不到的作用。

一八八一年四月，莫爾上校和里考德牧師把嘉樹送進了北卡羅來納州內陸城市特勒姆的杜克大學聖三一學院（後改名杜克大學）。大學的創始人朱利安·卡爾（大商人、大財主）答應資助嘉樹學費和生活費。

嘉樹在聖三一學院開始作為「特別生」培養：讓他先上預備班，把其他學生要用十年學完的讀、寫和算術壓縮到只用幾個月學完；集中力量教他學好英語，並使他完全沉浸在《聖經》裡。

嘉樹是一個有志氣的小夥子，他不願完全依賴別人的施捨。他向船上的一個水手學會編織吊床的手藝，就用出售編制吊床賺來的錢，補助自己的生活費和學費。在假期裡，他挨家

7 鄧普·瑪文等著：《美帝侵略上海的罪證》第二頁，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五〇年版。

挨戶地賣書，並出售吊床。當時特勒姆地區，幾乎所有人的花園裡都有他編制的吊床。

入學兩個月以後，一八八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嘉樹終於用學得的英文寫出了第一批信。

其中有一封信是寫給他的海南島的父親的，附在另一封給上海的美國南方衛理公會佈道團團長傳教士揚·艾倫（林樂知）博士的信一起，要求他將此信轉給他的父親。這兩封信分別敘述了他老家的情況和來美的經過。信上還以感激的心情講了教會和卡爾夫婦給他的幫助。<sup>8</sup>

儘管學校給了嘉樹這麼多幫助，但那樣的課程負擔對於他來說，仍然是十分沉重的。他以驚人的意志和記憶力克服了學習中的困難。對難以理解的功課，他乾脆死記硬背下來。他能夠複述讀過的《聖經》上的詞句和他在佈道會上聽到的說教，仿佛他已經懂了似的。這種善於模仿的才能，給老師們很深刻的印象和很大的安慰。院長克雷文博士在一八八一年六月九日的年度報告中指出：「他每一個方面都很出色，專心學習，一定會成功。」

在同學中，嘉樹也贏得了好感。他熱情肯幹，愛開玩笑，所以成了一個有吸引力的熱心的活躍分子。

但是，一年以後，嘉樹突然轉學到北卡羅來納州西鄰的田納西州納什維爾市范德畢爾特大學神學院學習。據《宋家王朝》中透露，這是因為嘉樹與朱利安·卡爾的堂兄弟卡爾教授的女兒埃拉關係過於密切，教會認為這不利於對他的培養。

<sup>8</sup> [美] 詹姆斯·伯克 (James Burke) : 《我的父親在中國》第六至九頁，紐約一九四二年英文版。伯克的父親步惠廉在中國傳教，是宋嘉樹的好友。以下所引宋嘉樹致林樂知的信，皆載該書，不再一一注明。

一八八三至一八八五年，宋嘉樹在范德畢爾特大學神學院度過了整整三個年頭，獲得了豐富的知識，結交了一些忠實的朋友，為他以後的事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他的同學約翰·奧爾牧師後來回憶時給宋嘉樹這樣的評價：「他腦子靈，努力準確而流利地使用英語，通常充滿了機智和幽默，脾氣好。小夥子們開始喜歡他，帶他參加校園裡的所有社交活動。他備課很認真，所有的考試都及格，畢業時，在神學方面是班上的優等生。」，他的同窗好友賴特牧師後來這樣回憶：「他個子不高……身體結實。他性情開朗，愛笑，所有的學生都歡迎他。他是一個才思敏捷、中上水準的學生。」<sup>10</sup>

宋嘉樹對學校生活感到滿意和愉快，但並非樂不思蜀，而是經常懷念故鄉和親人。有一個星期天早晨，他照常起床後與同學們在早餐前到小教堂聚會，交流宗教上的靈感時，默默無言地站了片刻，突然淚流滿面並嘴唇哆哆嗦嗦地說：「我是多麼可憐！多麼寂寞！遠離親人！久在異鄉！我覺得我真像密西西比河中順水漂浮的一片小木屑。」<sup>11</sup>

對故鄉和祖國的思念，促使宋嘉樹更加努力地學習。他天真地認為基督果真能幫助他拯救祖國，對回國傳教充滿信心。一八八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當他得知教會已決定畢業後派他回上海工作時，他給林樂知寫了一封充滿激情的覆信：「接奉手書已有數日，確實不勝欣

9 《回憶查理宋》，載《世界言論》一九三八年四月號。

10 「美」羅比·尤思森：《宋氏三姐妹》第七頁，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11 同上。

慰。我看到你完全把你的工作、生命和精神奉獻給了上帝。我希望上帝恩賜，讓我儘快見到你。……在我結束我的學業後，我希望我能把光明帶給中國人。我生活的目的是行善、敬人、讚美上帝；對別人行善，拯救他們免遭永恆的懲罰。但願上帝幫助我。」

這封信充分地表示了他對祖國人民的熱愛和對基督上帝的虔誠。強烈的愛國主義與虔誠的宗教精神的統一，對大多數基督徒來說，是一個普遍的現象，雖然其中有著許多天真浪漫的色彩。

一八八五年五月，宋嘉樹以優異的成績在大學畢業了。不過他還想在美國繼續深造，學點醫學，以便回國後更好地幫助自己的同胞。這本來是無可非議的事。從耶穌佈道開始，行醫就是基督教分內的工作，是爭取民心、輔助傳教的重要手段，而且熱心的卡爾也表示樂意贊助宋嘉樹學醫的要求。但是教會這次一點也不「仁慈」，斷然拒絕了他的要求。他們顯然從嘉樹如此關心祖國命運的思想情緒中，感覺到了某種與他們的目標相悖的因素。他們要「拯救」的中國，絕不是將來與美國一樣富強並與之抗衡的東方大國，而是一個永遠供他們自由擺佈的殖民地；他們要培養的宋嘉樹也不是將來與他們平起平坐的高級神職人員，而是一個供他們任意驅使、忠誠為他們服務的奴才，一個低級的傳教士。所以，他們認為他不配受到系統的高等的美國教育，甚至誣衊他希望留下來學醫的要求是貪戀美國「高級文明」的生活。一八八五年七月八日，范德畢爾特大學校長霍·馬克諦耶給林樂知寫了一封信，透露了他們的看法和打算。

信中說這年秋天就把宋嘉樹派到林樂知手下工作，要林「立即派他從事巡迴佈道團工作，即使不是坐車去，也要步行去」。對於宋希望學醫的心情，「我們認為不應該在他沒有在中國人當中努力工作之前就把他身上的那個中國佬的精力耗竭用盡。他早已『嘗過了安樂椅的滋味』，而且並不反對享受『高級文明』的舒適」。因此，「已經告訴他：我們已有多得足夠佈道團所需的醫生，不再需要了」。<sup>12</sup>

《宋家王朝》的作者在披露這封信時認為，這位主教撒了一個謊，說醫生過多，並在使報紙相信宋嘉樹要到林樂知博士的大學任教之後，私下卻指示林樂知把他放逐到內地去。「不用給予什麼特別的考慮，就是應該把他派到最低一層去。他要徒步一個城鎮一個城鎮地巡迴佈道。這樣做是故意貶抑查理在自己人當中的地位。中國人是很重視坐轎子之類的外表身分的，查理被降低到農民的地位了。」<sup>13</sup>

這位校長、主教還是上海南方衛理公會佈道團的負責人，他的這封對宋嘉樹毫不掩飾地表示侮辱和歧視的信，無疑宣佈了這個學生在未來宗教事業上前途的死刑，其後果是不難設想的。在宋嘉樹回國後，林樂知對他的一系列歧視、迫害的措施，終於使他無法繼續忠誠於他的傳教事業，而為了生存被迫轉向實業界。

一八八六年一月，宋嘉樹抵達上海，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國。

1 2 [美] 艾爾摩·克拉克 (E. Clark) : 《中國蔣氏家族》 (The Chiangs of China) 第二十二頁，紐約一九四三年版。

1 3 [美] 斯特林·西洛雷夫 : 《宋家王朝》第四十一頁，紐約一九八五年版。



由於那些不友好的活動大多發生在幕後，宋嘉樹當時又是一個處世不深的年輕人，對那些活動不可能察覺多少、多深；而那些真誠善良的美國人又給了他許多超出他希望的幫助和友誼，使他深深感動，永志不忘。所以，在美國八年的經歷，給宋嘉樹留下了永恆的、美好的回憶。他對美國人民產生了深厚的感情，即使他回國後受到教會上層人物歧視、打擊以後，也絲毫沒有減弱他的這種感情。他始終把美國看作自己的第二故鄉，保持著美國的生活方式，後來又先後把六個孩子送到美國留學。

當宋嘉樹在祖國的大地上正要施展自己的才能時，他才痛苦地看到了中美關係中陰暗的另一面：美國殖民者與其他殖民主義者一樣欺壓中國人民，特別是在租界中。

美租界在一八六三年與英租界合併，稱為公共租界。到一八八五年，公共租界內的外國人還不到四千人，中國人約十六萬。正是由於這占租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七的中國人民的辛勤勞動，才使租界的經濟得到飛速發展。但為租界繁榮做出巨大貢獻、為外國冒險家創造了億萬財富的中國勞動人民，在自己的國土上卻處於奴隸的地位。他們的身分證經常變換，作為居民的資格和權利遭到任意的踐踏和歧視，外國人卻享受著種種特權。

林樂知也毫不掩飾對新來的部下宋嘉樹的歧視。

林樂知原名揚·艾倫（Young John Allen），是個傲慢的學者。一八六〇年，他受美國監理會派遣到中國，曾幫助洋槍隊頭子戈登鎮壓太平天國的革命。他在上海傳教達四十七年之久。他不是用一般的方法引誘普通的中國人信仰基督教，而主要是通過辦報、辦學、著書和

寫文章等，來向中國的上層，即官吏、社會名流和知識分子宣傳西方文化和基督教的思想，並提出傳教士對中國政治改革的主張。他認為這樣比以往各國教會傳教士大多與中國窮人打交道的辦法，能在更大範圍內更快更直接地影響中國的政局。為此，他的著作和報紙必須用中國上層人士通用的文言文發表，於是他就雇「華士」<sup>14</sup>代筆。到一九〇七年他在上海病逝為止，據不完全的統計，他在華發表的譯著達兩千萬字，多是他口譯、口述，由「華士」整理發表。這些「華士」一般都是文言文上乘的「名儒」，如先後為他代筆的沈毓桂、蔡爾康等。《教會新報》（一八六八年創辦，一八七四年後改名為《萬國公報》）名義上主編是林樂知，實際是這些「華士」。為了培養這樣的「助手」，林樂知還在虹口辦了一座英華大學。他為這所學校培養出來的既能英文又能中文的「學者」而驕傲。林樂知及同他在一起的美國傳教士需要的是他們對中國進行文化侵略的高級奴才和幫兇，但那些曾為他們服務過的「華士」和學生大多數是有愛國心的。

當宋嘉樹認為自己曾受過美國式教育，操著一口流利的英語，並為此而躊躇滿志地回國的時候，做夢也沒有想到卻碰到這樣一個頂頭上司。他的長處恰恰為林樂知所不屑；而他的短處則為林樂知所鄙夷。他既不像林樂知所倚重的那些代筆「華士」的名儒，又不似林樂知所欣賞的精通兩國文字的年輕學者，因此當不了林樂知等美籍傳教士的「助手」。所以這個自

視可以在中國人中高人一等的宋嘉樹，被林樂知極端瞧不起。更使宋嘉樹不能容忍的是，這種現象還肆無忌憚地發生在天天標榜「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會內部，直接歧視到他這位在美國受過高等教育的神職人員身上。

宋嘉樹抵達上海前兩天，林樂知在給馬克諦耶主教和納什維爾佈道團委員會的一封信中，公開表示了這樣的偏見，信中說：「怎樣解決他（宋）的地位和薪金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有很多使人為難的地方。我們英華大學的男孩子和年輕人遠比他優秀，因為他們是——高等的——在英文和中文方面的學者，……得到了最年長和最能幹的傳教士的讚美。但『宋』決不會成為一名中文學者，充其量將只是一個失去民族特徵的中國佬。」<sup>15</sup>還聲稱他身邊的三個美國傳教士都不肯接受查理當助手。馬克諦耶主教的那封信，又加深了他對宋嘉樹的偏見。他不讓宋嘉樹享受一個由美國培養和任命的傳教士應享有的地位和薪俸，只給他定了不到十五元的月薪（只夠一個沒有奢望的農民維持生活）。他還不讓宋嘉樹探望十年未見的親生父母。更荒唐的是，在出入教堂時，還規定外國牧師走前門，中國牧師只能走後門等等。因此，宋嘉樹回國後的頭幾年，生活十分窮苦，精神上感到壓抑。

一貫具有強烈的自強和自尊心的宋嘉樹，很快便與他的頂頭上司林樂知博士發生了衝突。他先要求調到日本去工作，以便脫離林樂知的領導，但未獲批准。於是，宋嘉樹希望以驚人

的毅力忘我工作，來改善自己的處境。他脫下西裝，穿上長袍，戴上瓜皮帽，改變了長年在國外養成的與中國老百姓格格不入的生活作風；他學會了地地道道的上海話，深入地研究經史，不管嚴寒酷暑，病貧交加，堅持在上海的吳淞、昆山及蘇州地區巡迴佈道，並在一所教會學校教書。他日夜奔忙，設法使佛教徒、道教徒、回教徒對耶穌基督發生興趣。在蘇州他還為婦女建成一座醫院。

正在這努力時，有一天他遇見了從波士頓回來的牛尚周。牛尚周同情他的處境，決心幫助他。於是，他的命運開始出現轉機。由牛尚周介紹，宋嘉樹與名門閨秀倪珪貞結婚了。婚後，他又秘密加入了反清組織三合會，入股經營美華書館，並改進擴大書館業務，使書館除《聖經》外，還可以印刷教科書等各種書籍以及一些報刊。

與此同時，他在教會中的地位也開始得到改善。一八八八年，他被提升為正式的牧師；第二年，調到上海地區；一八九〇年停止巡迴佈道，成為上海郊區川沙地區傳教士。宋嘉樹機敏地利用這些條件，更快地發展了自己的事業。他給美國聖經協會當代理人，替它出售《聖經》及其他宗教書刊。接著，又大量翻印這種書刊，甚至從好幾個傳教團體和林樂知的《萬國公報》得到優厚的傭金，為他們承印包括西方歷史、科技方面的書籍。在這類業務的掩護下，還秘密為反清團體印刷宣傳品，為主張君主立憲的教育家、姻兄溫秉忠印刷西方教科書等。另外，宋嘉樹還擔任當時上海一家大麵粉公司（阜豐麵粉廠）的經理，為他們進口、安裝機器，並且擁有這個廠的股份。據說，他是上海「第一個代辦外國機器的商人」，「為中國人擁有的

工廠進口重型工業機械的第一批中國人中的一個」。<sup>16</sup>這樣，在宋慶齡出生前一年，宋家的經濟已經開始好轉，完全可以不靠教會的施捨和束縛過日子了。於是，宋嘉樹當機立斷，向教會辭了職。他表示要做美國「南方衛理公會佈道團的一名獨立的工作人員，或者說是一位盡其所能為佈道團工作而又不依賴美國國內的教會來維持生計的工作人員」。他當時正負責主持衛理公會的新教堂，那是由（美國）坎薩斯城慕爾兄弟捐贈的，是當時中國最好的一座教堂。教堂有所很大的主日學校，配備著一批優秀的教師。宋嘉樹任該校校長並親自在主日學校裡負責著一個班。<sup>17</sup>

除此以外，宋嘉樹還大量翻印中文的《聖經》和其他宗教書刊，無疑也是他對基督教事業在中國發展的特殊貢獻，而他對基督教最大的貢獻，則表現在創立中國基督教青年會<sup>18</sup>的活動中。

基督教青年會最早傳入中國是在一八七六年，但只在一些學校中建立小組織。一八九〇年，基督教在華傳教士舉行全國大會，正式向美國提出請求派員到中國來組織基督教青年會。

16 [美]艾蜜莉·哈恩(Emily Hahn)：《宋氏家族——父女·婚姻·家庭》第二十六頁。新華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美]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第六十六頁。

17 參見宋嘉樹給美國羅利《基督教宣導者》主編里德的信（一九九二年九月八日），轉引自[美]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第六十一、六十二頁。

18 基督教青年會，是英國基督教徒喬治·威(Georg Williams)於一八四四年六月六日建立的。系針對當時英國青年中流行的酗酒、賭博及享樂、放縱現象，鼓勵熱心宗教的青年向所認識的青年宣傳福音，引導他們改邪歸正。青年會後來發展成為以青年人為主要物件的服務於社會的慈善機構，在世界各地建立組織，總部設在日內瓦。



由加拿大和美國組成的基督教北美協會於一八九五年首次派遣了萊會理牧師到中國開展青年會的活動，正式成立了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宋嘉樹辭去傳教士的工作後，在經營印刷業和工商業的同時，以滿腔熱忱投入到創辦青年會的事業中，成為組織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的負責人之一。他不僅在上海活動，還走遍全國幾個大城市，終於在一九〇〇年正式成立了上海市基督教青年會。翌年，宋嘉樹資助的上海青年會館落成。此後，其他城市的分會也逐漸成立。

宋嘉樹為什麼在辭去教職之後仍以如此巨大的熱忱從事於宗教活動，同時又傾注於實業呢？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結識了中國偉大的民主革命家孫中山，決心獻身革命事業；而宗教可作為當時革命地下活動的一種掩護，金錢則是革命經費的重要來源。

在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響下，宋嘉樹樸素的愛國思想和對外國帝國主義歧視中國人的不滿情緒得到了昇華。從此，他的命運又發生了一次新的轉折。宋嘉樹命運中的第一次轉折，是脫離堂舅的羈絆，走上獨立奮鬥的冒險之途；第二次轉折，是由傳教士轉營工商企業，經濟狀況得以好轉。現在，又由實業家轉為兼做革命黨人，則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最根本性質的轉折。

宋嘉樹與孫中山的交往，過去一般著作認為是開始於一八九四年春季，即孫中山為了謀求民富國強，偕陸皓東北上上書李鴻章時，途經上海而結識的。但孫中山在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七日《致李曉生函》中明白地說：宋嘉樹乃是「二十年前曾與陸烈士皓東及弟初談革命者，二十年來始終不變，……弟今解職來上海，得再見故人，不禁感慨當年與陸皓東三人屢作終

夕談之事」。據此，再結合一八九二年陸皓東曾到廣州與一些人有過交往，而宋嘉樹在此期間為創辦基督教青年會到過廣州，有可能通過陸皓東與孫中山聯繫來推斷，孫、宋二人結識的時間要比一八九四年為早，應是在一八九二年間前後。<sup>19</sup>

當時，宋嘉樹雖從事傳教士和實業方面的工作，但他同情民主革命運動，是國內最早一批聆聽孫中山宣傳革命道理者之一。當他和孫、陸三人作「終夕談」時，深深地為孫中山「驅除韃虜，恢復華夏」的壯志所激動，認識到要拯救中國，就必須推翻清朝的腐朽統治，而不能依靠基督的「福音」，從而開始參與孫中山的革命活動。

宋嘉樹與孫中山有頗多有趣的共同點：一則都是廣東人，講同一種方言，又都會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再則先後都在國外接受西方教育，而且同是基督教徒；特別是兩人都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對改變祖國命運具有宏大的抱負。因此，他與孫中山結識後，很快成為孫中山的熱情支持者和摯友。

宋嘉樹依據自己在上海宗教界和實業界已取得的優越地位，以宗教和實業為掩護，秘密地進行革命活動，幫助推進民主革命事業。長期流亡海外的孫中山，每次秘密來上海大都住在宋家，甚至在宋家與同志密商革命。宋嘉樹在一八九五年，曾致電孫中山，第一個建議其「回國組織武裝起義」。一九〇三年夏，又積極支持過反帝愛國的拒俄運動。據《蘇報》記載：

19 參見尚明軒：《宋慶齡與孫中山的結合》，載《孫中山與國民黨左派的研究》，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七月版。

當上海教會進行拒俄活動時「在美華書館演說者以宋君耀如為最著，大旨謂耶教救國有自由之權，今俄人奪我之地，我欲自保，並非奪人之地也。教友能結團體，如日方新，有蒸蒸日上之勢云云」。<sup>20</sup>他還曾在物質上和精神上支持、援助孫中山的革命活動。由於他系革命的「隱君子」，所以在孫中山革命的公開記錄上，有關他的革命事蹟記載不多，為後世歷史研究工作者留下了一個神秘的「謎團」。說神秘，又不神秘。因為他的三個女兒——宋藹齡、宋慶齡、宋美齡，就是盛開在這些「謎團」上的人人都能看見的三朵鮮花。宋慶齡則是花中之奇葩，光彩奪目。

宋慶齡十分敬愛自己的父親。宋嘉樹曾用講故事的形式，向孩子們講述自己青少年時期的經歷。他一生中強烈的愛國主義、民主主義思想，對祖國和人民熾熱的愛，對舊的傳統習俗觀念及不公平的命運安排的反抗，為了崇高的理想不怕艱難困苦、不屈不撓奮鬥的意志，與外國人交往中熱情有禮、不亢不卑、謙虛自尊的精神，以及他對子女大膽而有遠見的培養——所有這些，對宋慶齡崇高品性的形成，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自然，宋嘉樹也培養了像宋藹齡、宋美齡、宋子文等另一類為人矚目的著名人物。這實現了他培養子女的兩句箴言：「不計毀譽，務必佔先。」

## 二、母親——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

母親倪珪貞（一八六九—一九三一年），浙江餘姚縣人，出生於上海。據宋家子女後來為倪珪貞所著的傳記稱：她是我國明代著名科學家徐光啟的後裔，她母親就是徐家人。

徐光啟還是我國最早皈依並傳播基督教的著名人物。那是在一六〇一年明朝萬曆年間，

屬於天主教耶穌會的基督徒馬太·萊四（Matteo Ricci，即利瑪竇），在北京接受徐光啟加入了天主教，被人稱為基督教在華「三大柱石之一」。他又是明代著名科學家，著有《農政全書》。當時，徐光啟是朝廷顯宦，任職禮部尚書，封為「文定公」。自徐光啟起，徐家世代為官。徐光啟後來離開北京，回到家鄉上海，住在現在上海西南部的文化、經濟、交通中心徐家匯。據說，「徐家匯」就是由此得名。上海天主教最大的教堂，就設在徐家匯徐光啟故居。

徐家匯後來劃入法租界，教會的活動受到了租界當局的保護。由於這種歷史的、宗教的和政治的關係，由於徐氏家族在基督教、法租界的威望和影響，倪珪貞後來與宋嘉樹結婚後，使宋家的宗教活動範圍和教友交際範圍都大大地得到擴展，從而十分有利於宋家政治經濟活動在上海的開展。



宋慶齡的母親倪珪貞。

倪珪貞的父親倪蘊山<sup>21</sup>是一個學者，對法律學的造詣很深，有類似法律顧問那樣的職位。他也是新教聖公會的教徒。由於工作關係，他年輕時就由浙江餘姚移居到上海，在徐家任家庭教師，後來和徐家一個姑娘結婚，成立了家庭。

倪蘊山受西方文化的影響，思想開明，對自己的子女都給予新式的教育。從小聰明伶俐、活潑好動的倪珪貞，更得到雙親的特別喜愛和精心培養。她三、四歲時就開始讀私塾，八歲進小學，十四歲考入美國基督教聖公會辦的培文女子高等學堂，十七歲畢業。在校學習期間，既熱心社會活動，學習成績也很優異，尤其擅長數學，鋼琴也彈得十分出色。所以，中學畢業後，就留在培文女校擔任教員。她是一位思想上受西方影響較深的婦女，非常熱心慈善事業和教會的活動，同西方教會的許多教徒結為朋友。

一八八七年仲夏，十八歲的倪珪貞與二十一歲的宋嘉樹結婚時，除帶有一份豐厚的妝奩外，娘家優越的社會地位——工商界、金融界及軍政界裡的各種社會關係也帶進了宋家。

他倆由於信仰、性格、志趣相投，結婚後的生活頗為美滿、融洽。對於宗教，倪珪貞似乎比丈夫更為虔誠。她篤信禱告靈驗有效，一跪就是幾個小時。她有剛強的意志，對事業、家庭和孩子的教育有高度的責任感和極嚴格的要求。她完全按照清教徒禁欲主義的規範生活，成為宋嘉樹的賢內助和孩子們難得的好母親。她積極參加社會工作，把自己的許多東西施捨



給貧苦的人。她視酗酒、賭博和跳舞為罪惡，不允許在自己家中進行這些活動。而且她把這一切都看作是神的意志，不允許違反。所有這些，從小就給宋慶齡以極深刻的影響。不過，宋慶齡在繼承這些優秀品質時，抹去了「神」的色彩。

像對待父親一樣，宋慶齡對母親也十分敬愛，而且愛得更加深沉。母親對她也是一樣。宋慶齡在住宅中很少掛家人的肖像，唯獨在上海的淮海中路住宅中，與會客室相套的餐廳牆上，莊重地掛著一幅母親倪珪貞的大型半身油畫像。這是二十世紀二〇年代一位美國畫家送給她的，她一直視為珍寶。掛在餐廳，是為了每天進餐都能見到，表示她對母親永久的懷念。母親的臉上有一層「永恆的微笑」，顯示她對兒女無限的愛。此外，在宋慶齡去美國讀書時，母親送的藍寶石胸針，她也一直珍藏在身邊。更加不易的是父母在這時送給她的一瓶葡萄酒，一瓶楓葉糖漿和一件毛背心，是讓她到美國後吃用的，她也捨不得動用；雖然後來經過幾十年的戰亂，國內國外多次旅遊與遷居。這幾樣禮物都保存下來了，現在陳列在北京宋慶齡故居的展覽廳裡。可見她對父母感情之深沉與細膩。

母親喜歡梳一種中國式的髮髻，並且要她的女兒們也這樣。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時期，一些革命婦女風行剪短髮，宋慶齡堅決拒絕了有人要她也效法的建議。這裡不單是一個孝順她母親的問題（實際上她在許多重大原則問題上，多次違抗父母，獨立做主），而是她認為不能把剪短髮表示自己革命，不能從表面上看問題。這表示了她不隨俗沉浮，不趕時髦，腳踏實地奮鬥的崇高而獨立的人格。

### 三、姐妹兄弟——民國時期政治經濟舞臺上的活躍人物

宋慶齡共有姐妹兄弟六人，她排行第二，有一姐、一妹和三個弟弟。他們的父母親對待自己的孩子男女平等，一視同仁，都給予新式的、正規的、優等的教育，從而培養出了多才多藝的姐妹兄弟。雖然時代的浪潮促使姐妹兄弟們後來選擇了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但都曾不同程度地影響過中國動盪的政局，成為民國時期中國政治經濟舞臺上的活躍人物。

姐姐宋藹齡（一八九〇—一九七三年），幼年聰明、堅強，五歲時入寄宿學校中西女塾（即馬克諦耶女子學校）讀書。由於學校沒有適合她年齡的班級，校長海倫·理查森小姐單獨教了她兩年。一九〇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她才十四歲的時候，就像當年她的父親一樣，孤身一人去美國求學，是為中國女生留學美國之始。由於一切均有教會幫助和安排，她當然比她父親當時的條件好多了。她於一九〇九年畢業於美國衛斯理安女子學校，成績優異，在音樂和表演方面也很有才華。宋藹齡回國後幫助父親做孫中山的秘書工作。一九一二年孫中山就任南京臨時大總統後，她正式擔任孫中山的英文秘書。後來，袁世凱復辟，孫中山反袁失敗，逃亡日本，她又隨全家到了日本。她在日本東京，遇到了過去在紐約結識的孔祥熙（一八八〇—一九六七年）。孔祥熙是山西鉅賈之子，曾留學美國耶魯大學攻讀經濟學，當時在東京華人基督教青年會任總幹事。宋藹齡諳於人情世故，素以愛財著稱。她於一九一四年九月與喪妻的孔祥熙結婚。所以，對宋孔的結合，一般評論認為是宋藹齡追求金錢所致。她「想成為獨一無二的女實業家，以便為中國婦女開拓一條道路，使她們可以在自己的名下積累大量財

富」。<sup>22</sup>他們婚後的歷史確實證實了這一種觀點，不過他們積累財富的手段卻主要不是正當的「實業」，而是靠玩弄權術，巧取豪奪。

宋藹齡婚後辭去孫中山秘書的工作，隨同孔祥熙一起回到山西，協助丈夫經營以山西為基地的錢莊等家業和銘賢學校（該校在一九一九年成為美國奧柏林大學的附屬中學）。一九二八年以後，她雖然未在國民政府擔任過什麼職務，但憑著她的各種特殊關係和詭詐手段，撮合宋美齡與蔣介石的婚事，促使宋子文投靠蔣介石，進而又利用孔祥熙先後擔任南京國民政府的工商部長、財政部長及行政院長等職的機會，聚斂了大量財富，創立了赫赫有名卻腐敗透頂的中國四大家族之第一富「孔氏家族」。宋藹齡及其子女生活奢侈豪華，醜聞迭出，為國人所不齒，與宋慶齡廉潔奉公的崇高品德形成鮮明的對比。

一九四八年，在國民黨政府敗亡前夕，「精明」的宋藹齡攜帶巨額「家產」，全家移居美國。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九日，她病死於紐約哥倫比亞長老會醫院，終年八十三歲。

大弟宋子文（一八九四—一九七一年），早年就讀於家庭私塾，然後進聖公會辦的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留學美國。一九一五年於哈佛大學畢業並獲經濟學碩士學位後，在紐約國際銀行工作。一九一七年歸國，任漢冶萍煤鐵公司秘書，在整理該公司帳目和財務工作中顯露才華。一九二三年，經宋慶齡推薦，擔任廣東軍政府英文秘書，後繼廖仲愷擔任廣東國

民政府財政部長兼中央銀行總裁，為解決廣東混亂而困難的財政經濟問題做出了較大貢獻。一九二七年，任武漢國民政府財政部長，並兼國民政府委員會常務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等職。一九二八年後，任國民政府中央銀行總裁、財政部部長等職。一九三二年四月後，歷任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部長及行政院院長等職，積極參與政府活動。一九三三年十月，辭去各項行政職務，以主要精力經營企業。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後，重新回到政界，歷任國民黨政府全國航空委員會代主席、外交部長、行政院長等職。一九四七年九月，改任廣東省主席兼綏靖主任。在此較長的過程中，他通過發行公債，乞求美援，吞併銀行等手段，為蔣介石政權奠定經濟基礎，同時也大大中飽私囊，其財勢在親友之中略次於孔家，《大英百科全書》稱他「享有世界上最大的富翁的名聲」。

宋子文又有傾向資本主義民主自由的一面，不滿蔣介石的專制獨裁。西安事變後他反對扣押張學良，並曾對張學良進行營救。雖然營救失敗，張學良受到永無盡期的監禁，但由於宋子文、宋美齡兄妹的關照，生活得到照顧。<sup>23</sup>抗戰勝利後，由於蔣介石發動的全面內戰爆發，國民黨統治區經濟迅速惡化。宋子文四處奔走「籌款」也無法填補蔣介石無底的軍費窟窿；加以在掠奪與分贓上的爭鬥，他與蔣、孔、陳（果夫與立夫）之間產生了尖銳複雜的矛盾。

23 張學良被押解到臺灣後，又得到宋子文的幫助，獲得一筆鉅款，得以對付各方面的應酬，維持寧靜的生活。提供這筆鉅款的是張學良的父親張作霖與建東三省鐵路時請的一位美籍技術顧問。這位美國人回國時，張作霖給了他一大筆錢，讓他投資經商。幾十年後，他成了億萬富翁，於是思報張家，到處打探張家人下落。最後得宋子文幫助，他到臺灣看望張學良，給了張一筆鉅款。（參見洛父：《我在臺灣結識了張學良將軍》，《團結報》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六日。）

盾，幾次受到他們的打擊，對他個人的抨擊也日益增多。因此，隨著國民黨政府的敗亡，他在一九四九年一月辭去職務，途經香港、巴黎，遷居美國。一九五〇年，又斷然拒絕蔣介石要他到臺灣任職的帶有威脅性的「緊急邀請」，定居紐約，專門從事經營石油股票、農礦產品期貨、槍支和新技术的生意。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日，病故於舊金山。

宋子文是近代中國政治舞臺上十分重要的人物，特別是二十世紀二〇—四〇年代，在中國政治、外交、經濟和財政金融諸領域都曾有過舉足輕重、別人不可取代的地位，是一位風雲人物。他在政治舞臺上曾是正角，做過一些益於國家和社會進步的工作，但卻以丑角、侏儒的角色而消逝，「以正劇始而鬧劇終」。

宋子文病死時，在美國的宋藹齡和宋美齡均未參加葬禮；遠在大洋彼岸的宋慶齡，正身處「文革」逆境，只得把對弟弟的哀思深埋在心裡。因為她在反對宋美齡與蔣介石的婚事，反對蔣介石獨裁、處理西安事變等問題上，和宋子文的心是相近的，這個弟弟也一直對二姐較好。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宋慶齡因採取反蔣立場而遭到危險時，宋子文曾給她通風報信；抗日戰爭期間，宋慶齡一度被幽禁在宋藹齡的住宅內，時有生命之危，又是宋子文幫助她擺脫困境，轉移到安全的住處。<sup>24</sup>所以，雖然後來二人政見相左，但姐弟情誼誠篤。一九二九年，宋慶齡回國參加孫中山的國葬活動，主要由宋子文相陪，二人一起在浦口迎靈，在上海住宅

24 參見鄧穎超：《向宋慶齡同志致敬崇高的敬禮》，《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及父母墓前挽手合影。在北京宋慶齡故居的實物和圖片展覽中，有一隻小型金殼收音機，是宋子文解放前送給她的，她一直珍藏著，平時用它來收聽廣播。

妹妹宋美齡（一八九七—二〇〇三年），幼年時先後就讀於家庭教師及中西女塾。一九〇七年，她自己要求隨二姐宋慶齡赴美求學，因年僅十歲，在衛斯理安女子學校註冊為特別生，至一九一二年她十五歲時始准為正式生入學。一九一三年因宋慶齡畢業歸國，她轉學到麻省諸塞州的威爾斯利女子大學，主修英國文學，由在該州哈佛大學求學的哥哥宋子文做其保護人，一直到一九一七年六月畢業。在美國將近十年，宋美齡在這裡受到了嚴格的美國化教育和訓練，是她性格的成型期。當她回國時曾自稱：「除了面孔以外，已全盤美國化。」<sup>25</sup>由於她在美國留下了比父親更深刻、更複雜的關係，從而為她以後成為高級「政治買辦」，縱橫捭闔於夫人外交，折衝樽俎於美國上層，溝通美蔣管道，爭取美援，輔助蔣介石支撐蔣家王朝二十二年及臺灣政治二十三年，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宋美齡一九一七年回國到上海後，重新學習漢語和中國文學等課程。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她與當時已成為令人矚目的鐵腕人物蔣介石結婚。婚後，擔任蔣介石的秘書和英語翻譯，隨蔣介石奔波於「剿共」前線，為鞏固蔣家王朝竭盡全力。與此同時，她曾先後任南京國民政府立法委員、革命軍遺族學校校長、兒童保育會會長等職。一九三六年初，又任全國航空委員會秘書長等職。西安事變時，她為

25 [美] 斯賓塞：《三姐妹——中國宋氏家族的故事》（THREE SISTERS: The Story of the Soong Family of China）第一百四十八頁，紐約一九三九年英文版。

挫敗親日派挑起內戰的陰謀，推動和平解決事變做出了貢獻。抗日戰爭及戰後期間，曾為國內外報刊撰寫文章，向國內及美國人民作廣播講演，並在一九四三年先後到美國國會和加拿大議會活動，爭取美國朝野人士對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的支持，從而為美國在中國推行扶蔣反共政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蔣介石曾對新聞記者稱讚說：宋美齡的價值相當於二十個師。抗戰勝利後，宋美齡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當南京國民黨政府臨近敗亡時，蔣介石為了爭取美援以挽救行將覆滅的命運，又派她到美國求援，結果是一無所獲。特別使她難堪的是，當她在華盛頓時，白宮公開發表了抨擊國民黨腐敗無能、不可救藥的白皮書。大廈傾兮風淒淒，宋美齡站在大洋彼岸，眼睜睜地看著他們慘澹經營二十二年的蔣家王朝分崩離析，只好於一九五〇年一月離美飛到臺灣。此後，與蔣介石共同做起「反攻大陸」的美夢，擔任「中國婦女反共聯合會」會長。一九六三年，當選為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多次以親善使節和蔣介石個人特使的身分去美國活動。一九七五年，蔣介石去世後，她即移居美國。但是，仍在臺灣保持著很大的影響，可以頤指氣使一股重要勢力。一九八一年，繼續連任臺灣第十二屆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關於她在美國的情況，據說住在紐約長島蝗蟲谷附近拉丁鎮孔令侃的別墅內，只有保鏢和醫生能夠自由出入別墅（因宋美齡未生育，在大陸時，她把宋藹齡的兒子孔令侃當自己的兒子一樣培養，以與蔣介石前妻的兒子蔣經國、蔣

緯國抗衡。<sup>26</sup>所以她去美後一直得到孔令侃的照顧。宋美齡偶然到巴爾的摩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醫院和曼哈頓史隆·凱特林癌病醫學中心檢查身體。她因患乳癌，兩乳早在一九七〇年被切除。<sup>27</sup>一九八八年蔣經國去世後，她曾返回臺灣，不久又離台赴美。二〇〇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宋美齡以一百〇六歲高齡在美國紐約的曼哈頓寓所辭世。

宋美齡從小讚賞大姐宋藹齡的為人處世。她於一九二七年在母親反對的情況下，經宋藹齡撮合，嫁給蔣介石後，更與宋藹齡兩相投契，互為利用。宋藹齡去世時，她特意帶一個五人護旗小隊和蔣緯國一起自台飛美，參加葬禮。

但是，她對二姐宋慶齡的態度相當矛盾，相當微妙。一方面，她從小與宋慶齡關係最密切，又共同就讀於中西女塾，後來又一起赴美留學，受到二姐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照顧，手足之情遠遠深於與大姐宋藹齡的感情。另一方面，在政治上，自從她嫁給蔣介石後，宋慶齡一直採取不妥協的反蔣反南京政府的立場，宋美齡也逐漸與宋慶齡疏遠，以至早在二十世紀三〇年代初，給宋慶齡寫信時，就由秘書代筆，使宋慶齡十分難過。<sup>28</sup>抗戰期間在重慶，鑒於抵抗共同的敵人——日本，宋慶齡曾與宋藹齡、宋美齡並肩戰鬥。宋美齡十分高興，並利用自己的影響，保衛宋慶齡的安全，兩人度過了政治上分道揚鑣後關係最親密的一段時期。

26 宋子昂：《關於揚子公司的一鱗半爪》。

27 參見（美）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第四百五十六、四百五十七頁，紐約一九八五年英文版。

28 陳翰笙：《談談孫夫人的高尚品格》，載《宋慶齡紀念集》第一百一十七、一百一十八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宋慶齡對宋美齡也是有感情的，但她對革命更忠貞，決不讓私人感情來影響自己的信仰。她常對人說：「美齡十分聰明。她拉丁文比我好得多，在音樂上也很有天才，鋼琴彈得特別好。我大兄弟（宋子文）也是有能力的，就是政治上同我背道而馳。我們一說起政治，各抒己見，往往是不歡而散。我們完全是為了思想信仰的不同而分開的。」<sup>29</sup>

公眾輿論對宋氏三姐妹的評論極其鮮明：

宋藹齡愛錢，宋慶齡愛國，宋美齡愛權。

二弟宋子良（一八九九—一九八七年），一九二二年畢業於美國凡頓貝特大學，回國後歷任國民黨政府外交部秘書及總務司司長、上海會文局局長、六河溝煤礦公司常務董事兼協理、中國國貨銀行董事兼總經理、中國建設銀行公司理事、中國銀行董事等職。一九三六年，任廣東財政特派員、廣東省政府委員兼財政廳長。抗日戰爭期間任滇緬路總辦，掌管租借事務，負責採購和運輸補給品，是宋子文的得力助手。一九四七年後定居美國。一九四九年全國解放前，在宋家與宋慶齡對立時期，宋子良與宋慶齡的關係始終較好，因此一九二九年宋家特派他去接宋慶齡回國參加孫中山的國葬活動。一九八一年宋慶齡病重時，宋子良是親屬中唯一從美國發來慰問電報的人。<sup>30</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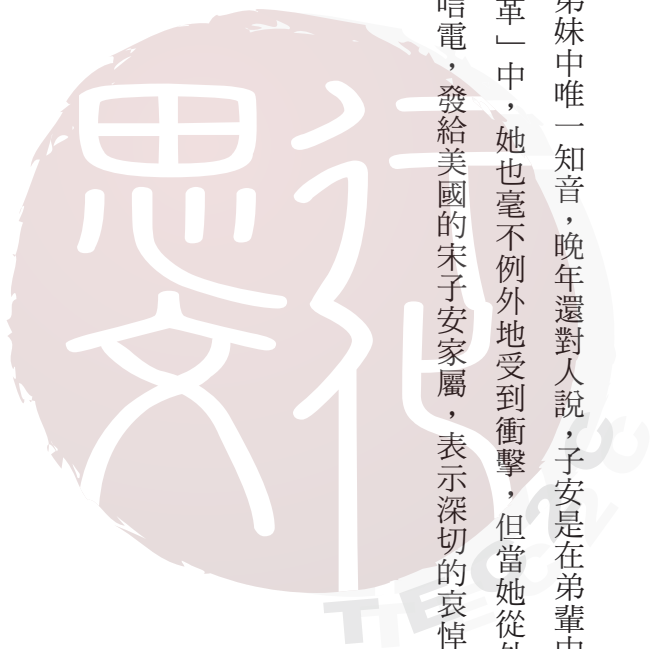
三弟宋子安（一九〇六—一九六九年），一九二八年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曾任松江鹽務

29 胡蘭畦：《難忘的記憶》（未刊稿）。

30 《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稽核所經理、松江運副（輔助鹽運使掌管鹽務行政事宜）、中國建設銀行公司經理及中國國貨公司監察等職。他也是宋子文經營金融業的助手。一九四八年擔任香港廣州銀行董事會主席，定居於美國舊金山。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在香港病逝，是六兄弟姐妹中年紀最小而最早去世的。

宋慶齡把子安視為親姐弟妹中唯一知音，晚年還對人說，子安是在弟輩中「最瞭解」她的。子安去世時，大陸正在「文革」中，她也毫不例外地受到衝擊，但當她從外國雜誌上看到子安逝世消息時，即親自擬寫唁電，發給美國的宋子安家屬，表示深切的哀悼。<sup>31</sup>



31 張珏：《在宋慶齡身邊工作二三事》，載《中國建設》（紀念宋慶齡特刊），一九八一年八月。